**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78 期・頁 197-206・2013
DOI:10.6152/jaa.2013.06.0010

# 「*Quo Vadis Formosa？*」—黃應貴《「文明」之路》的閱讀筆記

**吳 叡 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Civilization was an abnormal phenomenon. It involved the stat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both of which human beings have spent most of their existence avoiding."*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

黃應貴的《「文明」之路》三部作，是一部**宏觀的微型歷史**（macro micro-history）：作者以**全局的觀點**以及**普遍主義的問題意識**，來觀察東埔社布農人聚落這個具體而微的小社會。具體而言，作者將這個布農部落視為一個原型的「社會」，然後細部而深入地觀察其社會變遷。因此閱讀這部民族誌，彷彿像在閱讀 Durkheim 的《社會分工論》（1893）或 Tönnies 的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1887）這類古典社會學作品，它所觸發的思緒與想像，與其說是整個臺灣社會的發展歷程，不如說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在一個啟示性的意義上（heuristically），書中描繪東埔社布農人所經驗的「文明之路」，不僅可視為**地區史**（臺灣史）的縮影，更可視為**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即人類的文明之路）的縮影。而「布農」，則成為「臺灣人」，乃至「人」的隱喻（metaphor）。也因此，由這部書延伸出來的最主要理論與實踐問題—即所謂「臺灣未來將何去何從？」—必然既是地方的，也是普遍的或全球的問題。

2

所謂「臺灣未來將何去何從？」的提問，隱含了某種對百年多來臺灣「文明化」歷程的**批判性評價**。然而這段「文明之路」到底為布農人（與臺灣人）帶來怎樣的後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得作者必須在作品結尾做出此種**文明論式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反思**呢？

3

《「文明」之路》書中描繪近百年來東埔社布農人（以及臺灣人）「文明化」或現代化歷程的三個重要面向：（現代／民族）國家化[1]、資本主義化，以及基督教化。該書第三卷所討論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可視為資本主義化的深化（或者 anomie 化，表現在反覆出現的危機）。其中，（現代／民族）國家化與資本主義化（及其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階段）造成整個社會的劇烈變遷與共同體規範的解體。然而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這兩個歷史運動具有同源共生的關係（Mann 1986；Wood 2002），這個共生關係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不僅沒有瓦解，反而轉化成更緊密的同盟，更傾向資本，也就是 David Harvey（2011[2007]：第三章）所謂新自由主義國家（neoliberal state）的型態。因此作者在書中再三致意的問題「資本主義之外，還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這句陳述應被重新理解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組合之外，還沒有另外的可能？**」在這個脈絡之中，所謂「臺灣未來將何去何從」的問題，主要應被理解為**如何處理現代國家化與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後果**的問題。

4

資本主義預設了現代（民族）國家，因此要尋找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邏輯上不得不同時思考**是否存在國家之外的社會秩序之可能**（也就是**無政府**選項的現實可能性，包含回返前文明化時期的**無國家社會型態**的可能）。然而，無政府主義政治學者 James Scott（2009）指出，在當代條件下人類社會之**國家化已經是一個難以逆轉的現實：**「在當代世界，我們的自由繫於馴服巨靈(taming Leviathan)個艱難的任務之上，而非逃離它」（Scott 2009：324）。因此，所謂「尋找資本主義以外的道路」的工作，意味著必須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之下尋找新的經濟形式。但如果現代國家與資本原本就是密切結合，兩面一體，那麼為了追尋另類文明之路，顯然必須設想如何**分離或重構國家與資本的關係**。換言之，為了追尋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必須同時追尋只會反映資本邏輯與利益的國家以外的國家形式。借用 Scott 的話說，這意味著必須馴服巨靈，然後運用國家權力與能力（state capacity）探索資本主義之外的另類文明之路的可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因此所謂馴服巨靈，不只是**馴服國家的暴力性**，同時也必須**使國家權力與資本邏輯脫勾，進而運用國家權力制約資本邏輯**。在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性擴張的情境中，這意味著控制、運用國家權力來制約、防衛本國與跨國資本對本地社會生活全面性的入侵、滲透與支配。這似乎暗示著某種民主社會主義（而非社會民主）的方向。然而誠如 Perry Anderson（2000）所指出，在資本主義之外，當代尚未出現一個明確清晰的另類新思想選項，以及足以和資本力量抗衡的集體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摸索另類文明的想像，是一條遙遠漫長（*longue durée*）的道路。

6

此處浮現一個疑問或論證的闕漏（aporia）：如果作者試圖尋求國家與資本主義之外的另類道路，為何全書略過了過去近兩百年來，人類對於這個目標最深刻、最大規模的追求經驗，也就是從普魯東、聖西蒙、馬克思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反而連結到 Marcel Mauss 呢？

7

那麼**現在**應該要怎麼做？政治理論家 John Dunn（2005）指出現代的代議民主是人民馴服國家暴力的唯一而脆弱的工具。然而即使如此脆弱的武器此刻也在遭受資本的攻擊：社會評論家 Naomi Klein（2001）指出，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以在地的「民主和自決換取外來資本」的政治經濟安排，正在導致當代各國的民主倒退。當前的課題，**不只是思想的，也是政治的**—亦即必須**鞏固、深化與拓展民主**。具體而言，必須一方面強化公民參與的直接民主機制，另一方面落實第二代（社會權）、第三代人權（集體權）。

8

推動民主鞏固與深化的行動主體為何？現代化歷程中，在國家與市場外，還出現了第三部門：**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回應國家化與資本主義化壓力的產物，它追尋有別於權力集中與無限制資本積累的目標（民主化與公共利益）。儘管有其限制，這個部門仍是唯一可能推動國家與經濟改造的力量。我們必須一方面耐性地思考新的文明想像，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方面透過公民社會推動的民主化，迫使國家權力與資本邏輯脫勾，阻止資本對環境與社會生活的入侵——這似乎是當前唯一的道路（Wright 2010）。

9

公民社會形成的辯證：既是國家形成的產物，同時也是反國家（特別是國家之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的力量，吸收了無政府主義由下而上的、自主結盟的、平等主義的激進民主精神。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後國家社會內部的一種無政府驅力**（現代化規訓過程所激發的無政府驅力），最終表現於國家的民主化（政治到社會的民主化，以及公民權與人權的發展）。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詭論**：古典無政府主義所設想的自發性社會秩序，必須經由國家形成的中介與規訓，才在公民社會上獲得體現。如果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哲學的語言來說，人必須先變成公民，才會進行自發性合作（Shklar 1985[1969]）。

10

這個以公民社會為核心的民主運動既是單一民族國家層次的（national），也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就單一民族國家這個面向而言，民主深化表現在公民權的擴張，而公民權預設了一個有邊界的政治共同體，公民權的擴張將帶來公民對共同體認同的鞏固與深化（Klausen 1995）。民主深化同時也表現在運用國家以管制跨國資本入侵本國，因此具有民族主義色彩（2000 年以來拉丁美洲各國先後出現的左翼政權即是最典型例證）。大國操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遂行該國地緣政治與經濟目的的帝國主義作為（如美國強銷農畜產品、中國在非洲收購土地與糧食，以及對台「以商圍政」策略），更凸顯在地公民社會抵抗運動之「反帝」的民族主義色彩（Moyo 2012）。

就國際性這個面向而言，這個民主深化運動乃是被資本的新自由主義化所誘發，因此具有全球性的起源；它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各個國家，因此具有全球性的擴散規模。儘管這些運動的議題表面分散，其實都涉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可以互通聲息、相互連結，隱然形成一個世界性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即 Naomi Klein（2001）所說的「the movement of movements（諸運動的運動）」。[2] 用公民社會的語彙來說，這個運動的國際面向，表現在在地公民社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連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

**關於臺灣的國家化與資本主義化**：直到清領時代為止，臺灣主要處在統治力（國家權力範圍與穿透深度）薄弱的封建農業官僚國家（agrarian bureaucratic state）與某種初期的商業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現代國家的出現與資本主義化的進行，是在日本統治之下開展，然後在國民黨統治下完成的。這個過程乃是世界性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形成之歷史運動（後期）的一環，因此具備了這個歷史運動的普遍性格，但它同時也展現了臺灣基於特殊地緣政治位置所產生的獨特地方性。

12

**普遍性**：作為全球性歷史運動的一環，臺灣的「文明化」引導這個島嶼上的住民走過從地域性共同體與前資本主義經濟演變到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形成之變遷歷程，終於來到今日的新自由主義化階段，並且和全人類一起承受這整個過程所帶來的文化、社會與心理等層面的巨大變遷。在此意義上，「臺灣何去何從？」這個質問的言外之意（subtext），正是「人類何去何從？」。在這個層次上，前述關於如何處理國家化與資本主義化的一般性討論，可以為回答這個普遍性質問提供參考。

13

**特殊性**：臺灣作為「**多中心的共同邊陲**」或多數強權之間的「**介面**」（interface）的特殊地緣政治位置，深刻形塑了臺灣之民族國家形成與資本主義形成的軌跡，使這個過程產生了臺灣的特殊性格。處在諸**帝國夾縫之中**，臺灣數百年來一直是君臨東北亞之不同中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美國）相互爭奪與先後試圖兼併、吸收、模塑的對象（筆者稱之為「帝國的碎片」[fragment of/f empires]），因此它的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形成深受外部因素之影響（Wu 2004）。臺灣的民族國家形成經驗具有以下兩組二元對立的特徵：**政治史的斷裂 vs.社會史的連續**，以及**政權的不連續 vs.制度的積累**（Wu 2007；吳叡人 2009）。[3] 第一組二元對立意味著政權更迭下，移民社會的持續整合過程；第二組對立則意味著先後外來政權之間制度繼承、積累與發展所導致的政治整合。整體而言，這兩組特徵說明**臺灣民族國家形成之迂迴、晚熟、未完成與不穩定性格**。比較而言，臺灣資本主義形成則具有深刻的**依賴**與**國家主義**（étatisme）性格（Amsden1979；Cummings 198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

中國帝國主義因素：1990 年代後半中國的崛起，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政治磁場，重新將形成中、尚未穩定的臺灣民族國家拉向中國民族國家的架構之中，啟動了**臺灣的再邊陲化與再附庸化**的過程。臺灣的再邊陲化與再附庸化，是一個國際政治與經濟互為表裡的過程。一方面，中國崛起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使臺灣的國際空間被進一步限縮。另一方面，中國迴避「民族大義」的論證，積極運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邏輯誘導臺灣進入中國政經秩序之中。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認同成為可購買的商品。事實上，中國的「以商圍政」就是**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商品化臺灣人的認同，從而購買這個認同**（Blau 1986[1964]；Lemarchand 1977）。[5] 中國對臺灣的領土收復型民族主義（irredentist nationalism）——一種**領土帝國主義**的型態，再一次說明**新自由主義具有與大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相互結合**的特質（Harvey 2005：140；另見 Collinicos 2009）。[6]

15

主體的消亡？：整體而言，所謂臺灣文明化經驗的特殊性是，晚熟與不穩定的民族國家、依賴發展型資本主義，以及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民族國家面臨**解體**與資本主義的附庸化危機。以哲學語言來說，臺灣的文明之路見證了**現代政治主體的形成與消亡**（之危機）。被兼併到當代中國政經秩序之內的臺灣，除了**中國民族主義、一黨專政，與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Dickson 2003）[7] 之外，將不會再擁有任何獨自的文明想像之選項。換言之，《「文明」之路》作者為臺灣所提出的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將完全喪失意義，因為新的宗主國已經為我們預先選擇了道路。這本書，也因此成為一個已死亡文明的見證與憑弔。

16

*Ultimum Quaestio: Quo vadis Formosa?*（臺灣，妳往何處去？）

17

最後的補充問題：《文明之路》的作者似乎暗示「前文明」時代的共同體文化規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自然之間相互主體、平等主義、互助、有能者扶助弱者等）可以成為另類文明想像的資源，然而「前文明」時代的，個體未分化出來之前的共同體規範，無法在當代情境下進行機械性複製。那麼應該如何將這些有價值的規範轉化為當代形式的規範呢？作者提出一個可能性：或許我們必須借助於當代的新的共同體想像機制（從深層的情感繫屬產生的共同體意象〔image〕或意想〔imagination〕）。然而這個說法似乎有點同義反覆（tautological），因為它既未解釋這個深層認同機制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亦未有說明它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在當代的條件下再生產。

## 附　註

1. 本文「現代國家」（modern state）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交互使用，指涉與資本主義興起同時出現，以直接統治（direct rule）為主要內容的國家形式。此處「民族國家」並非意指實存的「一民族、一國家」，而是遵循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所接棨的「民族—國家」理念來進行自我理解與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的現代國家形式。

2. 關於當代反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請參見 Tom Mertes（2004）。

3. 關於政治史的斷裂與社會史的連續，請參照吳叡人（2009）；關於政權的不連續與制度的積累，請參照 Rwei-Ren Wu（2007）。

4. 歷史學者 Bruce Cummings（1984）主張這是一種（日、美）霸權架構下的依賴發展；關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國家主義性格，參見 Alice H. Amsden（1979）。

5. 「交換」（exchange）本來就是認同形成的一種機制（Blau 1986[1964]），比較政治學者 René Lemarchand 更指出，在外來統治者與本地社會的連結過程中，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政治交換常用以整合本地社會，擴大其認同的機制（Lemarchand 1977）。當代中國基於經濟利益對臺灣進行的社會交換行為，對於臺灣人認同的長期影響，值得觀察。

6. 早在 2005 年，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即已觀察到中國在阿根廷等地進行傾銷，並迫使當地產業瓦解，成為中國原料供應國的古典帝國主義作為（Harvey 2005：140）。根據 Alex Callinicos 的歸納，包含他本人與 Harvey 在內的當代部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經修正列寧古典理論的經濟化約論，主張帝國主義應被視為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主義與地緣政治交錯的產物，而意識型態因素（如民族主義）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從這個觀點來看，深深整合到全球資本過程的中國，藉資本與商品輸出以及地緣政治的雙重作用而進行帝國主義式擴張，絕非不可預見之事（Callinicos 2009：1-21）。

7. 對於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型態是否可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筆者持保留態度，因為新自由主義要求某種法治（rule of law）與政治上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的制度性門檻，而這兩者顯然均為當代中國政體所付之闕如。

## 引用書目

吳叡人

2009 〈重層土著化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台灣史研究》16（3）：133-163。

Amsden, Alice H.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3): 341-379. DOI:10.1177/009770047900500304.

Anderson, Perry

2000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1-20.

Blau, Peter M.

1986[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allinicos, Alex

2009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Cum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 1-40. DOI:10.1017/S0020818300004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urkheim

1964[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George Simpson, tr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

2005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Atlantic.

Harvey, David

2011[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ausen, Jytte

1995 Social Rights Advocacy and State-Building: T.H. Marshall in the Hand of Social Reformers. World Politics 47(2): 244-267. DOI:10.1017/S0043887100016099.

Klein, Naomi

2001 Reclaiming the Commons.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81-89.

Lemarchand, René

1977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Ethnicity in Africa: Competing Solidarities in Nation-Building.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Steffen Schmidt, Laura Guasti, Carl Landé and James C. Scott, eds. Pp. 100-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rtes, Tom, ed.

2004 Movement of Movements: Is Another World Really Possible? London: Verso.

Moyo, Dambisa F.

2012 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klar, Judith

1985[1969]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Cambrd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nnies, Ferdinand

2001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José Harris, eds. José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d, Ellen Meiksin

2002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 London: Verso.

Wu, Rwei-ren（吳叡人）

2004 Fragments of/f Empires: The Peripher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Social Science Japan 30 (December):16-18.

2007 Discountinuous and Cumulative Nation-State Formation: A Political-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Democracy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ter the Third W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New Democracies'. 13-14 August, Taiwan Think Tank,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